



# 《论语》成书新证及其方法论反思\*

刘光胜

**摘要:**《论语》20篇,其中10篇被战国中晚期以前的出土文献引用过。郭店简引用《论语》中的《述而》《泰伯》《子罕》篇,清华简《治政之道》、上博简《君子为礼》部分内容与《颜渊》篇相同,安大简采摭《论语》7篇8条,这些为《论语》成书于战国前期,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撑。郭店简引《论语》,与今传本语序、文字、虚词多有不同,“子思领纂《论语》”说仍存在商榷的余地。《礼记·坊记》称“《论语》曰”,可能不是战国时期的面貌,而是后世注文混入正文。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海昏侯墓竹简《论语》皆无书名,可知直到西汉中期,“论语”之称并未被时人普遍接受。利用出土文献考察古书成书问题,既要观其同,又要察其异。“层累”说与二重证据法相结合,是古书成书问题取得突破的基本路径与方向。

**关键词:**《论语》;成书;郭店简;安大简《仲尼曰》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6-0108-08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至战国中晚期以后,庄子以寓言、故事虚构孔子形象,“子曰”类文献鱼龙混杂,有时难辨真假。而《论语》的特点是“正实而切事”,经过弟子们相互辩驳、共同编纂而成,是考察孔子思想、洞悉儒家真精神最为基础的材料。对于《论语》的成书时间,学者或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sup>[1]</sup>,或主张在西汉景、武之际<sup>[2]</sup>,前后相差竟接近三个世纪。至于《论语》的作者,学界或强调集体撰作,或凸显曾子、子思领纂,或认为出自汉代博士之手,“看似寻常最奇崛”,更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学术疑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简帛文献中与《论语》密切联系的篇目大量涌现。定州汉墓竹简《论语》、肩水金关汉简《论语》、江西南昌海昏侯

墓竹简《论语》,乃《论语》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传本。郭店简、清华简引用采摭《论语》的文句,上博简也有多篇《论语》类文献,安大简《仲尼曰》、王家咀楚墓竹简《孔子曰》部分语句可与今传本《论语》对读<sup>①</sup>,这些无疑为考察《论语》成书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与契机。出土文献与传世本《论语》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以前学界多强调两者的相合之处<sup>②</sup>,笔者拟从差异性的视角出发,重新梳理《论语》的成书过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 一、《论语》成书时间蠡测

杨伯峻指出,《论语》成书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sup>[3]</sup>。郭沂主张《论语》的成书,当以子思卒年(公元前402年)为限<sup>[4]</sup>。王铁、单承彬强调

收稿日期:2022-04-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出土文献与民本思想溯源研究”(19BZX056)、山东省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孔子研究院重点项目“出土文献与易学数字卦综合研究”(22KZYJY01)。

作者简介:刘光胜,男,山东省泰山学者,中国孔子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曲阜 273165),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研究。

《论语》的结集在孟子以前<sup>[5]、[6]48</sup>。赵贞信认为《论语》乃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编纂<sup>[7]</sup>。从春秋末期至西汉,从子思卒年至孟子卒年(公元前289年),学者对于《论语》成书的时间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礼记·檀弓上》曰:“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孔子去世,门人向子贡请教如何服丧。子贡提出“若丧父而无服”,众人皆服膺子贡之言,心丧三年而无服。《汉书·艺文志》说“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孔子去世后,弟子追慕不已。在三年“心丧”期间,他们把孔子生前的语录,汇集起来,这便是《论语》之书编纂的雏形。公元前479年,是《论语》成书的时间上限。清儒廖燕曰:“余谓此书为大圣人经天纬地之文,岂他人可能代笔者耶?”<sup>[8]</sup>孔子生前亲定《论语》,此说与《汉书·艺文志》明显冲突,恐不足为据。

搜集文献引文,是我们考察《论语》成书时间的主要方法。顾炎武《日知录》卷七载:“《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有八。”<sup>[9]</sup>在《论语》之外,社会上还流行着大量的孔子语录。而孟子认可的孔子之语29条,其中21条没有收录到《论语》之中。如果孟子是《论语》的编纂者,这些话语肯定会收入《论语》之中。正因为没有收录,说明孟子已无缘参与《论语》的编纂。

战国中期以前儒家的传承谱系,是孔子—曾子—子思—(子上)—孟子。孟子生卒时间约为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孟子》多有仿效《论语》的意蕴<sup>③</sup>,可知《论语》成书当在孟子之前。

《孟子》引《论语》,却没有称引《论语》书名,学者或据此认为《论语》成书在孟子之后。而出土文献摘引《论语》,为《论语》成书提供了明确的时间参照。郭店简《语丛三》曰:

志于道,虔(狎)于德,厶(依?)于仁,游于艺。<sup>[10]</sup>

《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两相对照,郭店简《语丛三》明显抄撮《论语·述而》之语。郭店简《尊德义》:“民可使,道

(导)之;而不可使,智(知)之。”<sup>④</sup>《论语·泰伯》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文字变动,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所以尽管“道”与“由”不同,我们依然可看出郭店简《尊德义》抄撮、化用的是《泰伯》篇。

《论语·颜渊》中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清华简《治政之道》曰:“上风,下草。上之所好,下亦好之;上之所恶,下亦恶之。”<sup>[11]</sup>君子为上,为风;小人为下,为草。不难看出,清华简《治政之道》也是简化、摘抄《颜渊》篇而成。

安大简时代为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其中《仲尼曰》篇杂采今本《论语》8条,证明《论语》成书最晚当在公元前350年之前。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据AMS碳14年代测定,清华简的年代是公元前305年±30年。根据文献撰作早于下葬时间的规律,郭店简、清华简成书皆当在战国中期以前。郭店简、清华简引用《论语》,原书肯定要早于引用它的书,加之这些文献南传楚地也需要时间,因此综合以上因素,《论语》的成书时间当在战国前期。

以《乡党》篇为界,《论语》前后十篇存在着称谓、文体的差异<sup>[12]</sup>。李庆将《论语》形成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孔子去世至战国中期,形成了前十篇的规模;第二阶段从战国中期至秦统一中国,收入后十篇的内容;第三阶段从秦统一中国至汉武帝、昭帝时期,《论语》已成型,同时有各种本子流传,形成不同学派;第四阶段从汉武帝、昭帝时期至东汉末,郑玄写定今传本《论语》<sup>[13]</sup>。

清华简抄撮、化用的《颜渊》篇,列《论语》第十二,属于后十篇<sup>⑤</sup>。安大简《仲尼曰》辑录孔子之言论,见于今传本《论语》前十篇的是《里仁》《公冶长》《雍也》三篇,见于《论语》后十篇的有《颜渊》《宪问》《卫灵公》《季氏》四篇。从清华简、安大简看,《论语》前十篇与后十篇成书皆在战国前期。因此,李庆将《论语》后十篇置于战国中期至秦统一中国,明显是不妥当的<sup>⑥</sup>。《论语》前十篇与后十篇虽有文体、称谓的差异,但与成书早晚没有必然的联系。

简言之,《论语》成书过程复杂,文献征引是判定《论语》成书时间的重要依据。《孟子》引《论语》的篇目,有《里仁》《公冶长》《泰伯》《子罕》《先进》《颜渊》《宪问》《阳货》。出土文献引用《论语》篇目10个,分别是《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颜渊》《宪问》《卫灵公》《季氏》。除去重复者,《论语》20篇中有12篇,被战国中晚期以前的文献征引过。尤其是安大简,时代为战国早中期,引用《论语》7篇8条,成为《论语》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有力佐证。

## 二、《论语》的作者问题

《论语》成书,大致经历了平时记录、辩难还原、增补润色三个阶段。该书内容来源不一,章句多有重复,思想观点也不尽一致,作者自然非一人。关于《论语》的作者,学界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孔门弟子集体编纂说。《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sup>[14]</sup>

孔子之语,弟子平时多有记录。孔子去世后,他们整理而成《论语》。班固说孔门弟子共同编纂,并没有说何人领纂,其说上承自刘向、刘歆。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sup>[15]</sup>汇集夫子之语,以成《论语》,赵岐明确肯定《论语》出自七十子之徒集体编纂。

二是少数弟子领纂说。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sup>[16]</sup>郑玄主张仲弓、子夏等编纂《论语》,却未说明理由。《文选·辩命论》李善注引西晋傅玄之说:“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论夫子言,谓之《论语》。”<sup>[17]</sup><sup>1494</sup>孔子弟子中,仲弓“可使南面”,他德行出众,擅长政事;子夏精于文学。《论语》多言修德,文辞洗练,所以学者猜测当出自德行、文学两科的弟子。汪中、刘宝楠等学者持类似的说法。

柳宗元《论语辩》曰:

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sup>[18]</sup>

《论语》书中记载了曾子去世之事。曾子小孔子46岁,他去世之时,孔子之弟子大都已经离世,仲弓、子夏等不可能将曾子辞世之语,编入《论语》。《论语》曾子、有子称“子”,乃弟子尊称老师之语。与陆德明相比,柳宗元补充了具体证据,其“曾子弟子撰作”说可信度较高,在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李建国认为《论语》初编于子贡,终编于曾子弟子<sup>[19]</sup>,杨朝明、贾庆超则认为《论语》起于曾子,终于子思<sup>[20,21]</sup>,皆是柳宗元之说的变型。

三是成书于非儒家人士。清人崔述认为《论语》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后,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后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sup>⑦</sup>。崔述强调《论语》成篇于孔门弟子,成书于非孔门弟子。如果编纂者非孔子门人,那会是谁呢?单承彬猜测《论语》出自“邹鲁之士”<sup>[6]49-65</sup>。先秦古书的成书,是指主体思想、内容的形成,而非后期的制作(汇篇成书)。汉代《论语》有《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等版本,主要在齐鲁地区流传。《论语》的作者是邹鲁之士,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其弊在于过于宽泛。

《论语·卫灵公》曰:“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子张喜闻孔子之言,仓促之间没有简帛,便将孔子之言记录在自己束腰的带子上。《孔子家语·弟子行》子贡“退而记之”,《论礼》子夏“敢不记之”,《五刑解》再有“退而记之”等,弟子平时对孔子之语多有记录,而这些记录是《论语》最初的材料来源。个人对老师学说的理解可能传闻失真,而《论语》经过不同弟子之间的相互辩难,所以较为真实可信。

《论语》叙事最晚的内容,是公元前436年曾

子去世,此后再无事件补入。《论语·泰伯》曰: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病危之际,把门弟子召集在一起,说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刑戮了。孔子弟子,曾子最少,而且高寿。他去世之时,其他孔子弟子大都已经离世。《论语》中收录曾子去世前的话语,而且配有“启予足!启予手”的手势动作。这种现场感非亲见、亲闻者莫能记录,说明它的最终增补当出自曾子弟子。

先秦古书的成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后增补材料并不能等同于作者。曾子弟子补充的内容极为有限,他们只能增补曾子的言行。《论语》中子张、子夏等言行,曾子弟子增补不了。《论语》的主体内容、体例规模,是由孔门第一代弟子奠定的。他们之间的相互辩难,铸就了《论语》“正实而切事”的学术品格。不能因为曾子弟子的最后增补,而忽视第一代孔门弟子的学术贡献<sup>⑧</sup>。因此,《论语》作者为孔门第一、第二代弟子集体编纂的说法,最为允当。

子思为曾子弟子,学识出众,于是学者提出“子思领纂《论语》”说,但其中存在不少疑点。《孔丛子·公仪》: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子思乃孔子之嫡孙,与孔子关系极为密切,自然非他人所能比。子思说“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他坚信自己所得为孔子本意。但从他者的角度讲,别人敢质疑子思的话有违夫子之“意”,“非其正辞”,他们必然有充分的证据。否则,对鲁穆公信口妄言,那是“欺君之罪”。在子思生活的时代,孔子弟子都已离世。别人如何知道子思之言与孔子之语不同,很可能是将《论

语》与子思所引夫子之言对照。

相比较而言,《论语》属于孔子之“正辞”,没有受到战国时人的怀疑。而子思“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他亲自听闻孔子之语,或者是听别人所言。子思之所以受到怀疑,是因为他所言没有经过孔子弟子之间的互相质辩。如果说子思是《论语》的领纂人,为何他领纂的《论语》没有受到怀疑,他亲自听闻的(像《礼记·缙衣》《礼记·坊记》),反而受到怀疑?子思是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整理孔子遗说,多是借“子曰”的形式来阐发自己学派的思想。这种“润色”,与《论语》还原、保真孔子思想的编纂方式有所不同。

《礼记·檀弓上》: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晬,大夫之箠与?”子春曰:“止!”……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曾子听闻童子之语,为维护礼制规定,他强烈主张更换床席。然而更换床席未毕,曾子就去世了。从《礼记·檀弓上》看,曾子病重弥留之际,乐正子春、曾元、曾申在场服侍,而子思并未在现场。这里或许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从侧面说明乐正子春与曾子的亲密程度要胜于子思。《论语·泰伯》曾子遗言出自乐正子春、曾元、曾申的可能性,要比子思大。

学界多关注郭店简与今传本《论语》的相同之处,但两者多有差异。

一是语序不同。《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郭店简《语丛三》:“亡(毋)意,亡(毋)古(固),亡(毋)义(我),亡(毋)必。”<sup>⑨</sup>《论语》的顺序,是意—必—固—我,而郭店简《语丛三》的顺序,是意—固—我—必。

二是文字差异。“亡”与“毋”,“智”与“知”,属于音近通假,而其他字则不好用通假来解释。郭店简《语丛三》“虞”,古“甲”字,读为“狎”,与《论语·述而》“据于德”之“据”形体近似而实不同<sup>[22]</sup>。上博简《君子为礼》:“夫子曰:

‘回，君子为礼，以依于仁。’”<sup>[23]</sup>“依”字作“𠄎”。而郭店简《语丛三》“𠄎于仁”之“𠄎”，与楚简习见“依”字形体有明显的距离<sup>⑩</sup>。

三是虚词增省。郭店简《尊德义》引《论语》“而不可使，智(知)之”，和《泰伯》篇相比，增加虚词“而”字。

郭店简是子思学派的著作，郭店简《语丛三》《尊德义》引用《论语》，学者或据此认为《论语》是由子思领纂完成的。这种说法的不足之处有二。其一，郭店简属于子思学派，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其二，如果郭店简与《论语》皆出自子思学派，那么它们所用的《论语》版本应该是一样的。为何郭店简引用的《论语》，与今传本《论语》语序、文字、虚词多有不同？郭店简《语丛三》《尊德义》引用《论语》的语句，只能说明《论语》成书较早，并没有证据显示子思是《论语》的领纂人。

综上，《论语》编纂的重要原则，是弟子各自增补其师之事。孔子去世，门徒担心自己老师的学说泯灭，于是将平时记录的材料汇聚成一书。《论语》中子夏、子张、曾子等人的嘉言懿行，是由其弟子陆续增补的。曾子弟子只能增补曾子之事，增补的内容非常有限。不能因为他们增补时间在最后，便忽视第一代孔门弟子的学术贡献。《论语》作者当以第一、第二代孔门弟子集体为宜。郭店简《语丛三》《尊德义》引用《论语》，与今传本《论语》文字、语序、虚词多有不同，“子思领纂《论语》”仍是尚未坐实之说。

### 三、《论语》命名的过程

《论语》书名是何时出现的？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战国时期。《文选·辩命论》李善注引《傅子》说：“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论夫子言，谓之《论语》。”<sup>[17]</sup><sup>1494</sup>《论语》乃编纂者仲弓等人命名，时间自然在战国之时。此说最主要的证据，是《礼记·坊记》中出现了“《论语》”书名。二是西汉时期。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sup>[24]</sup>据王充之言，《论语》之称乃西汉孔安国、扶卿所补题。

战国时人引用孔子之语，常用“子曰”“孔子曰”“仲尼曰”“子言之”“子云”等形式。上博简《从政》辑录孔子之言，用的方式是“闻之曰”。郭店简《语丛三》《尊德义》、清华简《治政之道》，它们引用《论语》，从来都不称引《论语》的书名，有时甚至不称“子曰”。《孟子》《荀子》《韩非子》称引《论语》的语句，皆不用《论语》书名，这些证据说明战国时期未有《论语》之名。

安大简《仲尼曰》最后一句曰：“中尼之𠄎𠄎，仆快周恒。”<sup>[25]</sup>整理者将“𠄎𠄎”释读为“论语”，认为《论语》早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出现了<sup>[26]</sup>。实际上，安大简《仲尼曰》摘录《论语》少，而大部分语录不见于今本《论语》。严格讲，它并不是《论语》的删节本。安大简《仲尼曰》语句简短、明快，其体例类似郭店简《语丛》。笔者赞同将“𠄎𠄎”释读为“短语”<sup>⑪</sup>。安大简称孔子语录为“𠄎(短)𠄎(语)”，而不是“论语”，暗示战国中期“论语”之称尚未出现。

《韩诗外传》卷五：“《论语》曰：‘必也正名乎。’”<sup>[27]</sup>韩婴乃汉文帝时博士，时代早于孔安国。《韩诗外传》出现了“《论语》”，则说明王充之言有误，拟定《论语》之名的未必是孔安国。《史记·封禅书》：“《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传》之文见于《论语·阳货》篇，可知司马迁称《论语》为“《传》”。《后汉书·赵咨传》：“《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记》之文见于《八佾》。汉代《论语》有《论》《传》《记》《语》等多种称谓。

定州汉墓竹简出土于中山怀王刘修墓中，中山怀王刘修卒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定州汉简《论语》没有书名，各个篇目亦无篇题。海昏侯刘贺卒年是公元前59年，海昏侯墓竹简《论语》背面有篇题，如“雍也”“子路”“尧(尧曰)”“智道”等，但全文没有书名，《论语》之称是整理者根据内容拟定的<sup>[28]</sup>。定州汉简《论语》与海昏侯墓竹简《论语》互证，可知至西汉中期《论语》书名虽已出现，但未被广泛接纳、采用。战国时期没有书名，汉代多种称谓并存，《汉书·艺文志》择取《论语》，最终《论语》之称胜出，成为定名。此乃《论语》得名的大致过程。

《礼记·坊记》曰：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  
《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礼记·坊记》作为战国时期子思学派的文献，它引用《论语》中的语句，称“《论语》曰”，与当时人们称引的方式不同。结合《论语》书名出现的时间，《礼记·坊记》中“《论语》曰”可能是旁记字入正文<sup>⑩</sup>，是后儒增补以解释孔子之语的文字，而非战国时期文本的原貌。余嘉锡、杨伯峻以《礼记·坊记》来证明《论语》书名早出<sup>⑪</sup>，林存光、郭沂用《礼记·坊记》推定《论语》结集下限在公元前402年<sup>[29]</sup>，皆是不足取的。

#### 四、方法论之反思

《论语》所记孟敬子，乃仲孙捷之谥号。人死之后才有谥号，而周考王十二年（公元前429年）孟敬子健在，所以王铁、俞志慧据此推定《论语》成书的时间上限是公元前429年<sup>⑫</sup>。清华简《系年》第二章：“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sup>[30]</sup>“平王”是谥号，宜臼生下来便称“平王”，被周幽王废除太子之位后，《系年》作者依然称他“平王”<sup>⑬</sup>。古书是流动的文本，某人去世之后，后儒会将他的谥号增补进来，所以不能用谥号“孟敬子”来界定《论语》成书的时间上限。

定州汉简《论语·先进》篇：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孔子曰：“材不材……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无郭。吾不徒行以为之郭……从大夫之后也，吾不可……”<sup>[31]</sup>

简本“孔子曰”，对应的今本作“子曰”。梁涛先生注意到今传本《论语》与定州汉简《论语》人物称谓每每不同。今本《论语》后十章称“孔子”的地方，而简本多称“子”<sup>[32]</sup>。今本《论语》多称孔子为“子”，而安大简《仲尼曰》在摘录《论语》时，一律改称“孔子”为“仲尼”。在《论语》文本流传过程中，人物称谓难免会有变化。因此，“孔子”“夫子”“仲尼”等人物称谓的变化，都不能作为判定《论语》何时成书、成书于何人的依据。

程颐说：“《论语》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

者，惟二子不名。”<sup>[33]</sup>《论语》之中，曾子、有子称“子”，其他人称名，所以程颐怀疑《论语》出自有子、曾子之门人。实际上，《论语》中称“子”的，不仅有曾子、有子，还有冉求、闵子骞。且曾子弟子在传习过程中，会将“曾参”改为“曾子”。因此，称“子”不是判定《论语》作者归属的缘由。上文柳宗元以此定《论语》作者为曾子弟子，恐非。

走出疑古时代，旨在纠正“疑古过勇”的弊端，而非彻底抛弃疑古的精神。所谓的“层累”说，笔者的新解读是指古书并非作伪于一时一人，而是有着漫长的成书过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古书难免发生文本的变形，如文字增删、音近通假、同义互换、句序调整、章节有无、称谓改变等。要以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眼光看待古书的生成<sup>[34]</sup>。

过去学者强调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以抗衡顾颉刚的“层累”说。在对“疑古过勇”弊端已经充分认识的今天，笔者主张将二重证据法与“层累”说结合起来：以二重证据法考察古书生成的真实面貌，以“层累”说揭示文本前后的演变规律、特征。

郭店简、清华简称引、化用《论语》，安大简《仲尼曰》摘录《论语》，都意味着“《论语》战国中期以后成书”说的终结。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同之处，证明《论语》的早出，为古书成书时间提供关键性的证据，此乃二重证据法的应用。

汉代《论语》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等不同版本，其差别主要体现在：一是篇目不同。《古论语》21篇，有两篇《子张》。《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比《鲁论语》多《问王》《知道》两篇。二是文字差异。《古论语》与《齐论语》《鲁论语》640余字不同<sup>⑭</sup>。西汉传《论语》有昌邑中尉王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等十二家。但《论语》学的分化不可能从汉代才肇始。郭店简称引《论语》与今传本相比，文字、语序、虚词差异较多。安大简、郭店简摘引《论语》，与今传本亦多有不同。这些说明《论语》版本之分化，似乎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显现。

汉初《论语》主要在齐鲁地区传播,而由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可知,早在战国中期《论语》已经流布到南方楚地。赵贞信认为“论语”一名成立于景帝末或武帝初<sup>①</sup>。东汉时人仍称《论语》为“记”,《论语》之名出现之后,没有立刻得到普遍认可,而是存在较长时间的接受期。古书并非一成不变的,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差异之处,发掘古书被遮蔽的演变、生成的真实面貌,此乃“层累”说之展开。

综上所述,关于《论语》的成书时间,“战国前期”说、“战国后期”说、“汉代”说诸家激烈争鸣。郭店简、清华简引用、抄撮《论语》,尤其是安大简摘抄《论语》7篇8条,为《论语》成书于战国前期,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学证据。不能因最终增补出自曾子弟子,便忽视孔门第一代弟子的贡献,《论语》的编纂者当归为孔门第一、二代弟子集体,即七十子之徒。定州汉简、海昏侯墓竹简《论语》皆无书名,说明在西汉中期以前《论语》书名未被广泛接受。《礼记·坊记》称“《论语》曰”并非战国时期的原貌。郭店简引《论语》与今传本文字、虚词、语序的差异,说明《论语》文本的分化可能在战国中期已经出现。古书问题研究,包含着证真还原、层累生成的双重向度。以出土文献考察《论语》,须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将二重证据法与“层累”说结合起来,更有利于我们将古书成书问题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 注释

①本文所用安大简释文及研究成果,参见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22年版。②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25页;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梁涛:《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管子学刊》2005年第1期。③武内义雄之说,参见(日)内藤虎次郎等著,江晓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0页。④⑨句读有改动,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212页。⑤《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部分内容见于上博简《君子为礼》,说明《颜渊》篇成书不会晚至战国中期以后。⑥李庆所言第三阶段至武帝、昭帝时,也需

修正。定州汉简的下限已至汉宣帝时,可知直到汉宣帝时,《论语》依然处于异本并存的状态。⑦转引自邓瑞全、王冠英:《中国伪书综考》,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08页。⑧《论语》语句多有重复,体例不一。所谓“曾子及其弟子对《论语》全书做统一编纂、润色”,并没有文献学上的证据。⑩郭店简《尊德义》“依”字写作“悛”,《语丛三》与之亦不同。⑪安大简《曹沫之阵》“苟见短兵”中“(短)”字的写法,与《仲尼曰》简相同。⑫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已指出此点,转引自赵贞信:《“论语”一名之来历与其解释》,《史学集刊》1936年第2期。⑬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页。⑭王铁:《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3页。⑮类似的例证颇多,魏文侯是谥号,斯是人名,清华简《系年》作者在“魏斯”生前,已经称他“魏文侯”。⑯桓谭《新论》云:“《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⑰赵贞信:《“论语”一名之来历与其解释》,《史学集刊》1936年第2期。

#### 参考文献

- [1] 黄人二. 上博藏简(五)《君子为礼》与《弟子问》释:兼论本篇篇名为《论语弟子问》与《论语》之形成和主要编辑时间[J]. 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1(6): 65-80.
- [2] 朱维铮. 论语结集胜说[J]. 孔子研究, 1986(1): 40-52.
- [3]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9-30.
- [4] 郭沂.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338-339.
- [5] 王铁. 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J]. 孔子研究, 1989(3): 58-65.
- [6] 单承彬. 《论语》源流考述[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 [7] 赵贞信. 《论语》究竟是谁编纂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1961(4): 11-24.
- [8] 廖燕. 廖燕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365.
- [9] 顾炎武. 顾炎武全集: 日知录[M].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335.
- [10]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211.
- [1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玖[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9: 126.
- [12] 崔述. 崔东壁遗书[M]. 顾颉刚, 编订. 上海: 上海古

- 籍出版社, 1983: 616.
- [13] 李庆. 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论语》的文献学探讨[M]//《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8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7.
- [14]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717.
- [15] 焦循. 孟子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4.
- [16] 陆德明. 经典释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59.
- [17] 萧统. 文选[M]. 李善, 注.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 [18] 柳宗元. 柳宗元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10.
- [19] 李建国. 《论语》成书揭秘[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2(4): 1-12+51.
- [20] 杨朝明. 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J]. 中国哲学史, 2003(3): 32-39.
- [21] 贾庆超. 曾子领纂《论语》说[J]. 东岳论丛, 2003(1): 87-88+129.
- [22] 李零. 郭店楚简校读记[M]. 增订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95.
- [23]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五[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254.
- [24] 王充. 论衡[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272.
- [25] 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 二[M]. 上海: 中西书局, 2022: 44.
- [26] 徐在国, 顾王乐.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J]. 文物, 2022(3): 75-79.
- [27] 韩婴. 韩诗外传集释[M]. 许维遹,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01.
- [28] 朱凤瀚. 海昏简牍初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56.
- [29] 林存光, 郭沂. 孔子评传[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160.
- [3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贰[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138.
- [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49.
- [32] 梁涛. 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J]. 管子学刊, 2005(1): 98-102.
- [33] 程树德. 论语集释[M]. 程俊英, 蒋见元,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0.
- [34] 刘光胜. 史学: 在主观与客观之间: 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J]. 学术探索, 2009(6): 92-98.

## The New Proof of Completion Time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its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Liu Guangsheng

**Abstract:** There are 20 article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0 of which have been cited by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Guodian Bamboo Slips quoted *Shu'er*, *Taibo* and *Zihan*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Some of the contents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 and Shangbo Bamboo Slips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Yanyuan*. An Da Bamboo Slips collected 7 articles and 8 piece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hich provided strong evidence suppor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word order, characters and function words between Guodian Bamboo Slips quot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today's biography. There is still discussion on the statement that "Zisi compile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Book of Rites · Fangji* sai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rite", which may not be the appearanc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ut the later generations' notes mixed into the tex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Dingzhou Han Bamboo Slips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Haihunhou Han Bamboo Slips have no title. It can be seen that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name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as not widely accepted by people at that time. When we use unearthed documents to study ancient books, we should not only observe their similarities, but also observe their differences. The "ceng lei" theory and the double evidence method is the basic path and direction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he issue of ancient books.

**Key word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mpletion time; Guodian Bamboo Slips; An Da Bamboo slips *Zhongni Yue*

[责任编辑/知 然]